

毛泽东

○ 正确对待冤枉和委屈

○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

○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

○ 人需要有欢快的闲暇生活

○ 善是对恶的抵抗

○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谈人生



101701

A463
A

● 名人谈人生丛书 ●

毛泽东谈人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谈人生/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9

ISBN 7-5006-1424-1

I. 毛… II. 中… III. ①毛泽东思想-人生哲学
②人生哲学-毛泽东思想 IV. A 463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70 1/32 6 印张 2 插页 75 千字

199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印数 18,001—24,000 册 定价:7.10 元

326/30

序

罗国杰

《毛泽东谈人生》一书，反映了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并贯穿在他一生活动中对人生的意义、目的和态度的根本理解。阅读这本书，不但可以了解、研究毛泽东如何理解人生、把握人生和创造人生，而且可以使我们受到教育，从而更加自觉地实现人生的价值。

从《毛泽东谈人生》一书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确实同他对人生意义的深刻理解，同他力求寻找人生真理并确立自己的人生信念，同他的高尚的道德品质以及正确的人生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谈到毛泽东论人生问题时，应该看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关系。一般来说，世界观包含着人生观，人生观是世界观在人生问题上的具体体现。任何一种人生观的形成，总是同一定的世界观的确立密不可分的。因而，对一个人来说，世界观的变化，最终必

然会影响以至决定人生观的价值取向。在1920年以前的青少年时期,正像毛泽东自己所说的,那时,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不论从世界观还是人生观上来看,在接受革命思想的同时,又都受到西方的唯心主义的、二元论的以及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1920年以后,毛泽东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确立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他的为人民服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个人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和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的人生价值观。

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不同阶级的地位不同、利益不同、要求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人生观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生的意义、目的和态度的问题,也就是人为什么而活着的问题,或者说是怎样生活才更有意义、才最为值得的问题。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也包括人生的理想、人应当如何对待贡献与索取、如何待人处世以及怎样对待“逆境”和“顺境”的问题。同时,任何一种自觉的人生观,都有一个怎样正确对待自己、完善自己和正确对待他人和完善他人的问题。

这里,仅从三个方面,谈谈《毛泽东谈人生》一书给我们的启示。

一、要确立为追求真理而奋斗的志向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能否在青年时期就立定志向，并为之坚持不懈地进行奋斗，对一个人一生事业的成败，有着关键的作用。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特别强调“立志”的重要。他孜孜不倦地熟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如饥似渴地追求当时的新的知识；他不辞劳苦地到民间去作调查；他虚心地寻师访友、到处求教；他虔诚地听取杨昌济等老师的教导，其中贯穿着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要寻找真理、立定志向，从而为这一真理而奋斗终身。毛泽东说：“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立志，就是要根据宇宙之真理，并决心为真理去作斗争。他反对那种不是为了真理，只是见了前辈在军事、教育上取得了成就，从而产生盲目效法的行为。他认为，这不能称为立志，这只能是“盲从”或“模仿”。所以他说，真正的“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以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到达之方，始为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他又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无得，即终身无志。”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为探索和追求真理，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从少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有树立远大志向的决心。1910年，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决定送他到湘潭一个米店当学徒，但是，毛泽东为了追求更多的新知识，决定不顾父亲的反对而去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校读书。毛泽东在离家前给父亲毛顺生留下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政治家西乡隆盛的一首诗，其中只改了两个字：“孩（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①。这首诗，表达了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目光远大、志在四方，反映了他在人生道路上对真理的勇于探索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反映了对把握人生、创造人生的刻意追求。

在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时期，正像毛泽东自己说的，他和朋友们的交往谈心、切磋学问，从不涉及生活小事，总是同朋友们“谈论大事”，讨论“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等认为应当和值得关心的问题。他深感当时社会风气的萎靡不振、因循苟且、积疲积弱、虚伪奢侈等，对社会的改造极为不利，从而提出：“现在的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毛泽东十分欣赏

^① 《西方‘毛泽东学’研究》第72页。

明末清初的著名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理应承担的责任。

1915年5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通牒，要求签订21条，5月9日，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21条，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毛泽东在声讨袁世凯卖国罪行和日本侵华阴谋的《明耻篇》一书的封面上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誓言，反映了毛泽东在追求救国救民、追求宇宙真理上的认识和决心。

正是在毛泽东为救国救民、寻找宇宙真理、为自己确立志向的重要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无产者，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终于找到了他长期以来所上下求索的宇宙真理，并立下了坚定的志向，为这个真理奋斗终身。

从1920年开始，毛泽东在组织工人、反对军阀的同时，更从思想理论上，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的信仰。他曾热心地搜寻那时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他曾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从那时起直到

1976年毛泽东逝世，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论环境怎么险恶，不论情况多么复杂，不论工作多么困难，他始终都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追求完美的、纯洁的社会主义。他无愧于一个坚定的、从不动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为了承担追求宇宙真理的艰巨任务，毛泽东特别强调健康身体对于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重要。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他认为“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他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只有强健的身体，才能达到“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的目的。他从历史上的许多事例，结合个人之深切体验，从各方面论证了健康的身体对于增加知识、调节感情、坚定意志、增强信心、使事业成功的重要作用。毛泽东认为“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只有首先使自己的筋骨强劲、体魄健壮，才算真正懂得了“事有本末、知所先后”的真正意义。

二、坚韧不拔、矢志不移，正确 对待人生中的顺境和逆境

人生的“志向”和理想确立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毅力，为实现这一理

想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人生就是奋斗，而人生目的的实现，更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必然会遇到各种曲折和失败，而“志向”愈是“远大”和“崇高”，就必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和挫折。而且，只有在克服和战胜巨大的困难中，才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毛泽东认为，对于一个坚强的人来说，愈是在困难面前，才更容易显得出他的顽强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他说：“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在实现人生理想的过程中，面对一切困难，应当抱着“愚公移山”的态度，坚持下去，不断工作，并且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把握人生、创造人生和为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中，怎样正确地对待“逆境”，是考验一个人能否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一个试金石。一些人虽然也有远大的理想，也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但往往不能正确对待逆境，在逆境下消极颓废、悲观失望，最终走向沉沦。在毛泽东同志的一生中，曾经多次在逆境中处于很困难的情况，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再地感受到逆境对他的考验。他受过多次冤枉和委曲，受到过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他“被开除过党籍”，撤消过军职，不让他指挥军队，说他搞宗派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但是，他一直都把这些作为一种对自己的锻炼和考验。他说：“对于

那些冤枉和委曲,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机会主义、撤消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把它看作是一种有效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毛泽东曾多次论述过他对人生逆境的看法。他希望在我们新社会中,事情能够尽量处理得公正、公平,但是,不管怎样,任何人都会有一个正确对待逆境的问题。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人生的过程总是包含着无数复杂的矛盾。一个人有了理想的“志向”和实现这一“志向”的决心,但往往要遇到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也往往会因各种原因而陷入“逆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正确地认识产生“逆境”的原因,冷静地考虑如何在“逆境”中把握机遇、创造条件,坚韧不拔、矢志不移地最终使逆境转变为顺境,使自己的人生理想能够得以实现。毛泽东曾援引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古代许多能够正确对待“逆境”的人,在创造人生价值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业绩。司马迁说:西伯囚于羑里,从而演出了《周易》这部不朽的巨著;孔子颠沛流离,得不到重用,终以《春秋》传世;屈原屡遭放逐,世传《离骚》之赋;左丘双目失明,竟著《国语》一书;孙臆两脚被斩,仍写出《兵法》名著。其他如

吕不韦之著《吕览》，韩非之著《说难》《孤愤》以及《诗》三百篇的出现，都是身处“逆境”而发愤所为，顽强拼搏的结果。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困难的情况下，必须要充满为实现宇宙真理、为实现自己人生目的的信心。他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句，反映了他在长征途中同困难作斗争的坚定信心。他写的《愚公移山》，反映了要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的勇往直前的精神。

毛泽东认为，不但逆境是对人的考验，如何对待“顺境”，也是事业成败的重要关键。他强调，在事业发展不断取得胜利时，在顺境中，最重要的是要头脑清醒、谦虚谨慎。他认为在人生道路上，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思想，是最有害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在顺利只是初露曙光的时候，他已经考虑到革命胜利后可能会产生的骄傲自满以及由此而可能出现的政治腐败的现象。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从李自成的“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当中国的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却发人深醒地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

征走完了第一步”。他强调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表达了毛泽东对“虚心”和“骄傲”在我们事业成败中的作用所作的最富有哲理性的概括。

确实，“顺境”和“逆境”是每一个人为达到人生理想所必然会遇到的现实。现实生活说明，有些人本来处在发展很顺利的条件下，但却因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贪图享受、腐化堕落而身败名裂；有些人，虽然因某些原因而陷入“逆境”，但由于能够正确对待，自觉地与“逆境”斗争，不作“逆境”的奴隶，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最终，又总是能够把“逆境”变为“顺境”。“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对于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有志者来说，“逆境”往往更促人发愤，促人进取。事业的成功、人生价值的实现，又总是同环境的磨难、困苦的考验分不开的。积极的、正确的人生态度，应该能够正确地对待“顺境”和“逆境”。

三、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 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 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特别重视人格修养和道德品质的提高。从传统教育来说，他向往中国的圣人、贤人的理想人格，从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看，他强调个人的“自我完善”，结合起来，他强调“尽吾之心、完吾之性”、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人生追求中的最为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一方面是坚决批判其“愚忠愚孝”和“鄙视妇女”的“三纲”思想；另一方面对传统伦理道德中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对豪侠英雄、见义勇为、替天行道等思想，从不同的方面，予以扬弃和继承。他同情劳动人民、痛恨官僚地主，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广大群众谋幸福，为他人而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实践，以及中国优良道德传统，对毛泽东的道德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关系。

毛泽东对伦理学，有着特殊的爱好。他说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

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① 可惜的是,《心之力》这篇文章已经看不到了,但可以推测,这是一篇论证、阐发和强调道德精神对社会有强大推动力的文章。对于蔡元培翻译的德国伦理学家鲍尔生所写的只有10万字的《伦理学原理》^②,毛泽东的批语,就有1万多字。这些批语,成为我们研究毛泽东早期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材料。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对人生目的的最根本的要求。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凡是他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都先做到。对于革命队伍中的道德楷模,他总是发自内心地热情赞扬,号召人民向他们学习。他在祝贺吴玉章60寿辰时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作坏事”。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更明确提出:

^① 《西行漫记》第121—122页。

^② 鲍尔生原书有四个部分,蔡元培只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是一个信念和行动完全一致的人，是中国传统优良道德同共产主义道德高度统一的人。他不但在事业上有伟大的成就，而且把“立言”、“立功”和“立德”融为一体。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他总是把“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作为最高原则，他总是“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为中国革命事业，毛泽东无私地献出了个人的一切。正是在这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崇高思想境界中，他家庭中的六位亲人，包括他的亲弟弟毛泽民、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等，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后对家乡父老乡亲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是那样的大公无私、公正清廉，他谆谆教导湖南的桑梓乡亲，要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要向国家和人民提出不适当的要求，他还拿出自己的有限工资来资助亲人和乡亲，而不愿由国家负担这些人的生活困难。他非常重视对自己儿女们的教育，坚持要毛岸英到农村锻炼、同意并支持他到朝鲜作战以及在生活困难时期对李纳的严格要求，都说明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公无私

的品德。

在提高自己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境界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防止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毛泽东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加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造，以求得我们的进步，就成为每个革命者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他说：“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个人以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他提倡严于解剖自己，全面地、辩证地分析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看到自己的“虎气”和“猴气”。他认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一个道德高尚的“圣人”，既不可能是“生而知之”，更不可能是“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他必然是同一切不道德的思想作长期斗争后才能达到的。在《伦理学概论》一书的批语中，毛泽东说：“圣